

# 中国语文教育百年变迁的得失及反思

靳 健, 郭俊奇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中国语文教育近百年来的发展与变革,有得也有失。中国古代教育传统给人们展示一个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实践审美、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精神”;反思百年成就,给人们展示一个直面世界、勇于自新、学习科学、重建知识的“中国现代精神”,在视界融合之境展望我国语言文学教育“一心二门,十字打开”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中文教育;百年变迁;得失;反思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10-0010-05

## 一、学习优秀传统文化,重新打开“道德实践”之门

古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特征是伦理性教育,其核心思想是“民本意识”和“至善实践”。孔子的思想中早就包含了“民本意识”的观点。“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对“仁”的解释意义相当宽泛,而“仁者爱人”则是代表性的观点。“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孔子讲“仁”是为了把人的外在情感行为转换为一种社会博爱秩序,所以,“仁”以“百姓足”、“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怀”为主要表现形式。孔子仁爱学说由内而外、由个人而社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即民本意识。“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践仁成仁是孔子建构的主客一体的东方道德实践模式,是社会价值和个体人格融为一体的实践追求。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创造性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纲领的实施完全依赖于其天人合一的“至善实践”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这著名的“四端”说,即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与生俱来就具有

仁义礼智的情感萌芽(善端),后天的生活学习就是要不断地呵护它,发展它,而不要伤害它,改变它。孟子的“至善实践”论,一方面强调道德善端与生俱来,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所以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普遍性伦理义务与经验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感直接联系起来,植根于人性善的心理发展需求。

中国当代学者牟宗三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几千年来经由许多人发扬光大积淀而成,“至善”、“致良知”都是对“仁”之意蕴的发展。“此皆是将‘善的形式’向里收摄,以立善的形式之根。是则‘善的形式’不徒是外在的,且亦是内在的,是则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已至通透之境”<sup>[1]</sup>。他认为,“仁”体现了主客一体的实践理性,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元的思辨理性。古代主客一体的道德实践以“仁义礼智”为标准,经几千年之积淀,终于形成了一种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学者熊十力说:“中国哲学史上谈到万化根源,从来无唯心唯物之争,决非智不及此,亦决不是偶然之事。中国人于此盖自有一种见地。其长其短,尽可任人批评,而此一大公案,要不可忽而不究。”<sup>[2]</sup>

这种没有唯心唯物之争的主客一体道德实践理论,近些年来受到西方思想界的关注。加拿大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儒学、道学和佛学是一种宇宙哲学观,探讨的是教育他人如何与人和谐、与环境和谐的智慧。传播这些智慧的书籍在西方很多书店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有助于治疗西方世

收稿日期:2012-08-01

作者简介:靳 健(1949-),甘肃会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研究工作;

郭俊奇(1981-),甘肃秦安人,陇南师专中文系讲师,西北师大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界因为片面追求个性独立、科学技术战胜一切而带来的社会顽疾<sup>[3]</sup>。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sup>[4]</sup>西方的诸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反思现代化带给人类的破坏性影响时，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发现和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价值，认为中国智慧从宇宙本源上展示了自己的生命魅力，希望中国人不要破坏自己“后现代化”的优秀传统。

可是，自 20 世纪初叶以来，完全否定孔孟学说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的答辩书》说：“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把孔教、国粹、旧文学与科学、民主彻底对立起来，成了一种时尚文化，一种思想潮流。如果当时这样说是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个世纪以后还这样说就不合时宜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2001 年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中，仍按照阶级斗争学说诠释儒家思想。“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该书解释说：“一般劳动群众和奴隶跟着贵族统治者的教导跑，就像顺风倒的草一样。”<sup>[5]</sup>很明显，“君子”被界定为统治者，“小人”被规定为劳动者，说明孔孟提倡的“仁者爱人”、“至善实践”等美丽人性思想至今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之门仍旧关闭着。

生活论德育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教育理念，鲁洁 2010 年撰文说：“在生活哲学的视域中，不再将人之至善追求诉诸于静态的、孤立的人性的改造，而是奠基于是现实生活建构活动。”“人的改变与生活的改变是同一的，要改变人就要改变生活。”<sup>[6]</sup>在这里，主客一体的“至善追求”仍被抛弃在道德实践之外，自律的道德实践被客观化、他律化了，原本是个体的心理需求与生活实践，变成了外在规定性。大家明白，生活重构、生活水平和道德修养之间并非是对等关系，生活目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的变化并不等于道德水平的变化。就像一些腐败者生活水平很高，生活方式很丰富，但他们的道德水平却为人们所不齿；而一些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很低，生活方式很简单，他们的道德水平却很高尚。

当前，一些德育研究的部门及学者，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意识、至善实践”仍存有偏见，生搬硬套阶

级斗争学说和西方二元论曲解我国古代文化。这些现象说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信仰，重新打开“道德实践”之门，引领国人的道德情操修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 二、反思百年成就，重新打开“科学实践”之门

19 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智识之士看到了中国落后的诸多原因，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西方的哲学思想、民主社会理论、科学知识与技术纷纷被引进到中国，受其影响，中国语文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变化的特点就是“科学化”，或者叫做“知识化”。

首先，是课程名称和课程设置的科学化。1904 年 1 月 13 日，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新学制规定，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国文字”课程。癸卯学制的颁行，使中国教育的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癸卯学制的总体设计，反映了近代教育的基本精神；癸卯学制不但保持了我国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而且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中国第一次有了正式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字”课程名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王国维上奏朝廷，对文学科大学章程的课程设置提出了建议：“中国文学科目：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史，四中国文学史，五西洋文学史，六某国文学史，七心理学，八名学，九美学，十教育学，十一外国文。”<sup>[7]</sup>在今天看来，王国维的建议比现在许多高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仍要合理一些，因为它中西课程知识兼顾，语言、文学、哲学、美学、教育等科学搭配，尤其是突出了哲学的引领功能。

1912 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对课程名称做出了清晰的界定，称作“国文”。1920 年 1 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又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初等小学四年间全用语体文，并正其科目名称为“国语”。从此以后，“国语”、“国文”成为国家规定的正式课程名称，并且沿用 30 年之久。新中国于 1950 年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规定，语文就是普通话和用普通话写出的文章。这些界定，相对于古代教育来说，具有了比较清晰的逻辑意义。课程设置也开始趋于学科化、专门化。

其次，是课程内容的科学化。《奏定学堂章程》

规定开设“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课程,前者包括识字练习、对句练习、诵读诗词、日用文章等内容;后者包括阅读古文、练习作文、官话表达等,教学方法注重讲授法和诱导法。中国文学课程“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公布了新式标点符号十二种及其用法。3年后颁布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确定的教学目标有两项,第一项在第一学年学习语体文的文学作品,在第二学年学习文言文的文学作品。第二项在第一学年学习论辩文,在第二学年学习记叙文。同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必修科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确定的教学目标也有两项,一是学习文字学领域的知识,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和中外文学的变化趋势及特点。

1956年的中学教学大纲是文学、汉语分科的教学大纲。《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规定:初级中学毕业的学生应该学会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发音,掌握语法的基本规律,养成正确地写字、用词、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1956年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规定:结合文学作品的教学,讲授某些必要的文学理论常识和文学史常识,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文学作品;指导学生在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丰富语言知识,并学习用口头语言明确地表达思想感情。1956年的大纲采用汉语、文学分科,希望通过学习系统的文学知识和语言知识来改变当时过于追求教学政治化的倾向,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措。但遗憾的是因为被叫停没能发挥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使用统一的语文教科书。教科书采用文体单元编排形式,分别以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单元,文言文和语体文分开编排。每个单元都安排了“知识短文”,有计划地介绍语法、修辞、逻辑、立意、构思、结构、语言、表达方式、表现手法、文学与文化常识等内容。这一时期的师范大学中文系课程,一般按照文学(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作品选)、语言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学(文学理论、美学)与语文教育学四大板块设置。其中充分体现“科学化”的课程就是“现代汉语”,从语音(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元音、辅音、汉语拼音方案)、汉字(六书、七体)、词汇(读音、结构、意义)、语法(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复句)、修辞等五个方面科学而系统地呈现了该课程的知识构成,一扫几千年来笼统而玄妙的语

言教学内容与方法。

第三,是课程评价的科学化。1923年公布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规定:每周国语课为4学时,共用2年时间完成教学任务,学习合格者可获得16学分。同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必修科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规定:授课时间每周4小时,一学年授毕,共8学分。这大概是停止科举考试以来,我国最早采用学分制评价课程教学的尝试。1925年,廖世承、陈鹤琴编著的《测验概要》一书,作为师范学校的首选教科书出版。书中系统汇总了已经编制成功的诸种教育测验,并按照学科进行归类。在这些教育测验中,国文测验的研究成果丰硕,有文法测验、默读测验、作文测验、书法测验和文学常识测验等,测验的客观化、标准化问题设置受到了极大的重视<sup>[8]</sup>。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引进了国际上流行的标准化测验方式,目的是进一步推动语文教学评价的科学化水平。为了准确测量和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能力和发展趋势,组卷前先要设计“语文测试组卷双向细目表”,表中横向内容表示要测试的语文能力层级水平,纵向内容表示命题的知识范围,每道题有权重规定。如果是大型的考试,要对试卷进行难度、区分度、信度与效度的评定。然后根据组卷双向细目表检索抽题,组成试卷。语文考试的题型一般有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作文题几种,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型。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考评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和中学语文标准化测验方式接近,科学性反而比中学低一些,一般不进行难度、区分度、信度与效度的评定;另一种是课程论文,主要评价学生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创造力。

长期影响我国的语言本位课程观,就是在这种追求课程的知识化、科学化的潮流中形成的。语言本位课程观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强调落实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就是遵循了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在其影响下,语文教学和语文考试一直关注到音素、语素等微观知识,关注语言的逻辑性与精确性,采用标准化测验方式以利于养成严谨的学习风格<sup>[9]</sup>。

因为语言本位课程观过于注重语言规则的学习,淡化了培养听读说写言语能力的教学任务意识,所以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为提倡以知识为中心,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能动精神,引起了教育界的激烈批评。20世纪末对语文课程“工

具论”的批评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高潮,指出弊端,修正错误,寻求促进学生发展和语文课程发展的探索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批评的结果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语文课程内容中的逻辑知识被彻底删除了,语法修辞被淡化了,教材中的知识短文渐趋萎缩,所剩一点点知识也是随文学习,语文考试接近“零知识”边缘,语文课程成了名副其实的“感觉性”课程。这些现象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知识无用”负面影响。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2001年的《语文课程标准》和2011年的标准修订稿,只有要求教学达到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这些目标基本上属于智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但是没有学习内容目标。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智力目标和情感目标必须借助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才能达成预期的教育目标,没有内容目标的课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课程,会使教学缺失必需的文化土壤。语文内容目标退出课程标准,助长了新的“知识无用论”的滋长。有学者就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都是一些无用的知识,这些无用知识就好像商品一样,目的是通过考试来换取某种功利性的结果<sup>[10]</sup>。这种权威性观点对时下流行的“知识无用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现在我们所做的有些事情正好在演绎着成语的意义。反思百年成就,重新打开“科学实践”之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 三、促进个性发展,十字打开“美丽人生”之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确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应该受到批判和抛弃;但是“民本意识”和“至善实践”传统不仅是古代中国、而且是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永不言弃的精神瑰宝。至善实践之门由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开启,以后又吸收了老庄“道法自然”和禅宗“直觉顿悟”的精神,经明代王守仁融儒道释学说为一体,提出知行合一的人格养成理论,遂酝酿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解放人性、挑战生活的先声<sup>[11]</sup>。古代思想家旨在给人们展示一个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实践审美、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精神”,以涵养美丽人格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教育对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是比较薄弱的,科学实践之门一直处于掩闭状态。在西方世界,“知识就是力量”很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通过掌握知识去战胜对象或者被对象征服演变成了“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这种法则刺激和保护了西方人发展个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人也意识到自己逐渐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人的目的是掌握科学技术工具去战胜对象,结果自己沦为科学技术的工具而失去了自由。中国文化的悲哀是没有科学技术而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和掠夺,西方文化的悲哀是被科学技术牵着走进战争泥潭和恐怖废墟。

中国在反思。清末和文革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国出现了非常相似的思想潮流,那就是发现“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意识到打开国门和世界对话具有民族生存意义。中国语言文学教育需要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需要吸收他国的文学精神和语言形式,需要科学思辨理性创新建构我们的文化大厦,需要多种能被国际认同的“孔子学院”类模式来弘扬中华文明,世界走进中国的同时需要中国走进世界。我们反思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百年发展的历程,为大家展示一个直面世界、勇于自新、学习科学、重建知识的“中国现代精神”,以唤醒人格建设中的科学意识,强化人格建设中的自强行为。

西方在反思。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个人主义这个词通常用来刻画现代精神与社会及其机构间的关系特点,表现为一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一切的欲望。美国一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信息技术是二元的,无法抉择人的言语与交往的多义性,“黑客文化传达着一种权力与优越性的情感”,“电脑迎合了孩子们对于权力和明确性的幻想,并助长幻想”,精神成了无场域的东西,渐而脱去身体,转变为机器的幽灵<sup>[12]</sup>。另一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人类的心灵中永远跳动着渴求普遍和谐的愿望”,这种愿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追求人们在合作中化解争斗而共存共荣,崇尚为世界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他人的幸福而工作的生活伦理观<sup>[13]</sup>。

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探究如何解决现代性对人类精神的控制问题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美国的一位教育家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文化,没有一个民族具有比中华民族更伟大的生活精神,西方人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中国重视自己伟大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儒家与道家,中国人对精神具有的强烈的内在感觉,这正是建构现代课程所必要的<sup>[14]</sup>。

由于我们经常把“优秀传统”和“封建思想”相提并论,所以有意无意地把“至善实践”的优秀传统之门关闭了;由于我们不太习惯西方的思辨理性和科学方法,所以乐于接受种种“去知识”化的教育思潮而关闭“科学实践”之门。中文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时代性难题,就是做到“一心二门、十字打开”。“一心”指的是个体人格的“美丽之心”,也就是说要建设美丽人生之路,必须在人生坐标的一边打开“真”门,即“科学实践”之门,学习和掌握生涯发展必需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同时向另一边打开“善”门,即“道德实践”之门,呵护和发展人性的良知萌芽;当“真”门和“善”门同时敞开之时,个体的“美”门就会在人生坐标的

纵横方向自然打开,即“十字打开”,一条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人生之路便畅通了。也就是说,建设美丽人生离不开至善实践,也离不开科学知识,三者相与为一,则一荣俱荣;三者有所缺失,则一损俱损。那么由谁去完成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我们的国家政府、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国家政府应该组织那些自身已经十字打开“美丽之门”的专家,研制并推行既有美丽之境界,又有道德实践和科学实践之内涵的各类教育规划和章程。学校教师应该通过学历教育和专业自修尽可能地十字打开美丽之门,引领青少年在道德实践之路和科学实践之路上健康而有尊严的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 [1] 牟宗三.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198.
- [2] 熊十力. 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A].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2.
- [3] [加]史密斯.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前言. V.
- [4] [美]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13.
- [5]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2—24.
- [6] 鲁洁. 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引导生活的建构[J]. 教育研究,2010(6):5—8.
- [7]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57.
- [8] 廖世承. 新中华教育测验与统计[M]. 上海:中华书局,1932. 28.
- [9] 靳健. 现代课程理论的发展对中国语文课程观念的影响[J]. 西北师大学报,2001(2):8—10.
- [10] 钟启泉. 发霉的奶酪[J]. 全球教育展望,2004(10):4—8.
- [11] 靳健. 王阳明心学及其宇宙论审美境界[J]. 甘肃社会科学,2012(2):18—20.
- [12]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M].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2—56.
- [13] [美]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13—227.
- [14] [美]小威廉姆·多尔. 后现代课程观[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II.

##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losses of the centennial Chinese education

JIN Jian, GUO Jun-qi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is mingled with achievements and losses in the centennial retrospect.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in Chinese education that advocates the blending of subject and object, aesthetics and vitality, and harmony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By reflecting on the past, the writers argue for a creativ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pirit in the teaching reforms.

**Key words:** Chinese education; centennial overview; gains and losses; reflection

[责任编辑 霍素君]